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诗经学大辞典

诗经学大辞典

上册



夏传才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诗经学大辞典

上册

夏传才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学大辞典 / 夏传才主编.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34-7656-1

I. ①诗… II. ①夏… III. ①诗经－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9228号

书 名 诗经学大辞典

主 编 夏传才

策 划 杨 才 郝建国

责任编辑 郝建国 郝建东 刘书芳

装帧设计 牛亚勋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97.75

字 数 3547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7656-1

定 价 480.00元

中国诗经学会
《诗经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

主编 夏传才 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长华 河北师范大学博导、副校长,中国诗经学会会长

向熹 四川大学博导,中国诗经学会顾问,《诗经》语言学著述连续获得国家和国际图书奖

牟玉亭 深圳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国诗经学会理事

刘毓庆 山西大学教授、博导,文学院院长兼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

李山 北京师范大学博导、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

董治安 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组、教育部古籍委成员,山东大学博导,中国诗经学会顾问

蒋方 湖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

廖群 山东大学博导、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

特约编委

村山吉广 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诗经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顾问,指导“日本诗经学”部分

宋昌基 韩国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韩国诗经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顾问,指导“韩国诗经学”部分

林庆彰 台湾中央研究院经学研究室主任兼东吴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顾问

上册前言

一、编纂宗旨

编纂《诗经学大辞典》，是中国诗经学会2004年会员代表大会决定的学会集体工程之一，由于诗经各部分内容不同，编纂的体例不可能一致，故分为上、下两册。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诗经学在中国有二千五百年的学术史，在东亚文化圈各国有一千多年学术史。自17世纪《诗经》正式西传，一直是世界汉学的热点之一，已有四百年的学术史。1918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诗经学，也有将近一百年的学术史。我们把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诗经学，称为传统诗经学；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诗经学，称为现代诗经学；把世界各国的诗经学，统称为世界诗经学。我们编纂《辞典》应包括这三部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诗经学经历了几次转型，但总体上仍从属于传统经学。历代先哲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丰富的研究资料，经中国诗经学会同仁十余年之多方调查，现已知见《诗经》古籍存佚书目约一千八百四十三种。这些资料，使我们对这部古老元典的解读和基本理论，获得基本的认知。由于他们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科学发展总体水平的制约，也留下一些错误的认识和需要我们继续解决的课题，但无疑地，传统诗经学是我们必须继承的文化遗产。清理它们的发展过程，继承其中优良的成分，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新文化的方针性要求。

中国现代诗经学是二千五百年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是传统诗经学内部矛盾运动，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运动推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必然发生质变。用一句话来概括：由传统经学转化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从研究的内容到形式都发生本质性的变革。虽然在近百年的发展道路上，它经历过曲折和挫折，但近三十年又回到蓬勃发展之路，并开始了更新的现代化转型。据中国诗经学会同仁的全面调查统计，至21世纪初，现代诗经学著述书目已达五百余目（包括台、港），单篇论文在五千篇以上。由于我们这个时代学术开放，科学发展总体水平进步，文献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的现代转型，考古发掘的众多进展，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研究内容较古人大为扩展，认识水平较古人有许多进步。总结现代诗经学的新成果及其得失经验，有利于推进我们向先进文化的方向发展。

世界诗经学也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东亚文化圈各国与西方各国发展的道路不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它们发展的概况和代表性著作，它们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多种文字和多种版本的译著，还有众多以长篇专题论文形式发表的评论。应该承认，不同民族文化基础的外国学者的研究，可使我们耳目一新；特别是外国现代学者的研究，大大扩展了研究的领域，许多研究个案的见解不同于我们现有的认识。学术无国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强诗经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我们可以开拓眼界，借鉴他们的方法论，探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国诗经学会已经召开了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了三次地方考察，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同仁们有的长期在国外任教，或在国外讲学、访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料。至于调查统计世界各国的诗经著述目录，老朽今年九十岁，此生已难以见到。这一盛举，留待后继者努力了。

总括传统、现代、世界三大部分诗经学的主要内容，把它们分门别类，简明地条目化，使学习和研究者便于检阅参考，从而促进现代新文化建设，推动学术研究向先进文化的方向发展，是这部辞典编纂的宗旨。

二、内容说明

《诗经学大辞典》是一部专书的学术辞典，应该兼具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关于《诗经》的词语释义、成语诠释、名物解释、语言性质、语法句法、修辞、音韵等的说明，以及附录历代存佚书目，可以和一般辞书的性质和体例相同，这些内容合编为下册。上册着重在《诗经》的基本理论、三百篇主要内容、学术发展概况、历代学术流派、研究名家、著作、各种学术观点、争论的问题，以及研究的方法、多学科的主要内容等，总结性地予以介绍。所谓资料性，是把一般难见难解的重要资料以及散见于各种古籍的资料，辑集汇总，以减少研究者费力搜集之劳。兼具以上三个方面，才是名副其实的专书学术词典。

经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会、会长办公会议和本书编辑委员会讨论，我们达成以上共识，并且确定上册包含下列卷目和内容：

（一）基本理论卷：诗经学的一般基础知识、《诗序》问题的认知、三百篇的主要内容、总结性地作简明的理论说明。自从《毛诗》开始长期流传，《诗序》即列为《毛诗》各篇之首，成为《诗经》传统传本的主要部分。对《诗序》问题全面的认知，应该成为《诗经》基本理论的一部分。

2 诗经学大辞典(上册)

(二)三百篇解题卷:依《诗经》篇目顺序,为三百零五篇逐篇作题解。首先就《诗》说诗,作出现代基本取得共识的简要说明,再列出《诗序》和历代各家不同的诗旨解说。这方面的问题最复杂,以首篇《关雎》为例,古今诸家有五十多种说解,不必一一列举,只选择其中主要的、有影响和一定代表性的,以供研究者参考。我们编撰的意图是,既要列出主要的不同观点,又必须避免陷入经院式的烦琐哲学。

(三)诗体艺术卷:包括《诗经》语言艺术、诗体、艺术方法,其中适当地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文学的文学分析方法,同时评介古代文论家、古典作家、诗人对《诗经》的艺术评论,着重说明《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及其至今仍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鉴于历代诗话中散见对《诗经》艺术评论,编撰者沙里淘金,有选择地予以节录评介,借以减少研究者寻查翻检之劳,兼有工具书的作用。

(四)出土文献卷:本卷分三个部分:一是五十四种与《诗经》有关的出土文献;二是用出土文献考察十一个诗经学的学案问题;三是用出土文献考释《诗经》二十四篇诗中的二十九个诗旨或训诂问题。这一部分是前人未曾综合考察的。

(五)历代诗经学史卷:依照诗经学的发展阶段,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清末民初八个部分。现代诗经学(附台湾、香港的《诗经》研究)另列一卷。每个阶段有概况、学派、学者、著作。我们认为,如果采取一般辞书的方法,选择几个学派和少数名著,只作学者履历和书名的简录,作为专书学术辞典,那样做没有多少作用。我们赞同《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中国儒学百科全书》的体例,对概况、学派、学案、名家名著作简明而具有理论性的说明。《辞海》、《辞源》、《百科全书》都是综合性的辞书,所收《诗经》条目甚少。《诗经学大辞典》是专书辞书,所以著录的著作范围应当广博一些,应有学术史的概述并为有影响的著作写出“内容提要”。名著提要略长,次要的书略短,有的书可以只作目录学的说明。这样做,可以明白地显示诗经学史的整体脉络和学术发展的概貌,也能了解历代学者的学术观点、贡献及其得失,连在一起,则类同从古至今的诗经学史纲要,这样提供的资料,可供学者写诗经学通史或断代史使用和参考。

(六)世界诗经学卷:这项工作是没有人统一整理和综合研究的,我们根据现在所能得到的资料,分为“东亚文化圈”和“欧美各国”两个部分。主编认为不只作目录学式的载录,而对《诗经》的传播和研究学派,亦作概要式的说明,对名著和有影响的专题论文,作内容提要。非洲、西亚、南洋 17 世纪以后先后沦为外国殖民地,文化发展受到阻碍,目前我们没有得到它们传播和研究的资料,新加坡有少许资料,内容很一般,亦未录。在世界各国再作调查研究,必须国际同行共同努力,我们只是刚刚

起步。

(七)诗经文化学卷:《诗经》文化学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兴起的研究热点。本卷分三个部分:村社文化(含民俗文化)、礼乐文化、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诗经》时代的村社文化作了新的考察;征引古籍记载,考察礼乐的结合和具体应用;对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作出条目式的纲要,对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作出内容提要。

(八)中国现代诗经学著述书目,包括台湾的书目和香港的书目。中国大陆的书目从 20 世纪初至 21 世纪初;台湾、香港的书目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大陆个人自印或未曾流通的《诗经》著述我们见不到,台湾、香港新书亦或有尚未知见者,除这些情形外,这个书目基本上可称是较为完备的中国现代诗经学书目。

三、上册分工撰写人员

诗经学具有多学科性,自古以来,从无博通《诗经》多学科的学者。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学有专攻。这部辞书决非三四人所能完成。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一是中国诗经学,目前尚未能产生较为详备的多卷本通史,写得较好的只有几本断代史;盖集一人之力,只能如此。台北王礼卿先生集三四十年之功,只能完成四卷本《四家诗旨会归》。再如世界诗经学,必须通过各国《诗经》学者通力分工完成。所以本书必须约集多位学有所长的同仁共同撰写。然而一部书撰写人员多,若如俗谓“人海战术”,必然产生多种弊端,因此经讨论研究,商定每一学科基本上由一二人负责主撰,由他们找自己的助手协助搜集、整理资料、制作电子文本或撰写部分条目的工作。上册的分工如下:

基本理论卷、三百篇解题卷、诗体艺术卷:

夏传才执笔。这主要是将其过去的论著加以补充和修订,其中《颂》诗四十篇解题,由马银琴、高晓成完成。

出土文献卷:

廖群执笔。这是她独立完成并出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和香港大学出版社《诗骚考古研究》中有关《诗经》考古部分,经补充和修订。

历代诗经学史卷:

两秦、两汉部分,夏传才、董治安。

魏晋至隋唐部分,蒋方主撰。魏晋部分协助人文媛、肖丽;南北朝部分协助人吴桂美;隋唐部分协助人刘赛、陈鑫。

宋元部分,牟玉亭撰。

明代部分,刘毓庆、蔺文龙合撰。

清代部分,王长华主撰,赫琳、张鹏飞、赵爱武参加撰写。

清末民初部分,夏传才负责,郭万金、张蕴瑜博士参加撰写。

现代诗经学卷:

时间跨越基本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 21 世纪初,由林祥征主撰;台湾诗经学部分,夏传才负责。

世界诗经学卷:

亚洲部分,日本诗经学王晓平撰;韩国诗经学,朱贊斌撰;欧美部分:王丽娜撰写各国学者和著作,张万民撰写名著和专论提要,张思齐撰写部分概说。

诗经文化学卷:

原是张松如(公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尚未完成而逝世,由其弟子赵雨、卢雪松二人继续完成。

最后附录的《现代诗经著述目录》和《台湾诗经著述

目录》(附香港),是中国诗经学会曹建芬秘书辑纂。

全书最后由主编统稿,为求全书体例统一,对各部分章节条目和文字多寡比例,作了若干调整;为求内容充实或避免重复,亦作了一些补写、修正或删节。若有不当之处请予谅解。两册的统稿任务相当艰巨,老朽眼花手颤,每日要工作到深夜十二时许,但毕竟完成了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交托的一项重大工程。毓庆同志前时告诉我,我们合编的另一项工程《诗经要籍集成续编》亦已与出版社签约。我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可以安心了。但愿天假以年,在它们出版后能听到读者和方家指正,长我见识。知误而增识,自来是人生的乐事。

夏传才

2013 年 10 月

总 目 录

上册

前言

基本理论卷	(1)
三百篇解题卷	(47)
诗体艺术卷	(177)
出土文献卷	(251)
历代诗经学史卷	(299)
现代诗经学卷(附台湾、香港的《诗经》研究)	(539)
世界诗经学卷	(589)
诗经文化学卷	(653)
附录:现代诗经著述目录(附台湾、香港书目)	(685)

下册

前言

诗经词语	(695)
诗经成语	(1061)
诗经名物	(1147)
诗经语言学	(1351)
中国历代诗经著述存佚书目	(1453)

上册目录

基本理论卷	(1)
三百篇解题卷	(47)
诗体艺术卷	(177)
出土文献卷	(251)
历代诗经学史卷	(299)
先秦	(309)
两汉	(332)
魏晋南北朝	(356)
隋唐五代	(370)
宋元	(381)
明代	(419)
清代	(459)
清末民初	(523)
现代诗经学卷(附台湾、香港的《诗经》研究)	(539)
世界诗经学卷	(589)
亚洲	(595)
欧美	(626)
诗经文化学卷	(653)
附录:现代诗经著述目录(附台湾、香港书目)	(685)

基本理论卷

夏传才 撰

目 录

《诗经》的产生

诗的起源	(5)
葛天氏之乐	(5)
《尚书·尧典》纪事	(5)
甲骨卜辞和金文中的韵语	(6)
汉语发展新阶段的产物	(6)
礼乐文化的成果	(6)
祭祀乐舞	(7)
乐官制度	(7)
陈诗献诗	(8)
采诗说	(8)
三百篇的结集	(9)
从诗到经	(9)

《诗经》的编制体例

篇数和分类	(10)
三百篇全是乐歌	(10)
笙诗	(10)
逸诗	(11)
风、雅、颂的分类	(11)
释“风”	(12)
释“雅”	(12)
小雅、大雅的区分	(12)
释“颂”	(13)
十五《国风》	(13)
二《雅》的基本内容	(13)
三《颂》之分	(14)
四始	(14)
四诗	(14)
豳风、豳雅、豳颂之说	(15)
二《南》独立说	(15)
风雅正变	(15)

六诗	(16)
六义	(16)
三百篇诗的命题和分组	(17)
脱简错简	(17)
异文	(17)

时代、地域和作者

周诗	(18)
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辨	(18)
《周颂》的时代	(19)
《大武乐章》	(19)
《鲁颂》的时代	(20)
《商颂》时代学案	(20)
春秋宋诗说	(21)
商诗说	(21)
《大雅》的时代	(21)
《小雅》的时代	(22)
《国风》的时代和地域	(23)
“南音”的由来	(23)
二《南》的时代	(24)
邶鄘卫地域学案	(24)
《邶》、《鄘》、《卫》三风以乐调分	(25)
《王风》之辨	(26)
《郑风》的时代特色	(26)
《郑风》和“郑卫之音”辨	(26)
《齐风》的时代和地域	(27)
《魏风》的时代和地域	(27)
《唐风》的时代和地域	(27)
《秦风》的时代和地域	(27)
《陈风》的时代和地域	(28)
《桧风》的时代和地域	(28)
《曹风》的时代和地域	(28)
《豳风》的时代地域与“豳雅”、“豳颂”	(28)

4 诗经学大辞典(上册)

《诗经》中已知的作者	(28)
西周后期的诗人群体	(29)
民歌说学案	(29)

三百篇内容的现代分类

周族开国史诗	(30)
祭祀诗	(30)
农事诗	(31)
政治美颂诗	(32)
政治讽喻诗	(32)
社会怨刺诗	(33)
战事诗	(33)
宴饮诗	(33)
爱情诗	(34)
婚姻诗	(35)
伦理诗	(35)
贵族生活风情诗	(35)
民间生活风情诗	(36)

三百篇的价值和应用

中华文化的元典	(36)
---------	------

礼仪应用	(36)
教学科目	(37)
赋《诗》言志	(37)
引《诗》为证	(38)
季札观乐	(38)
文学价值	(39)
历史文献价值	(39)
语言学价值	(39)
《诗》无达诂	(40)
《诗经》的科学阐释论	(40)
世界文化遗产	(41)
诗经学	(41)

《诗序》学案

古老的题解	(41)
大序和小序	(42)
《诗序》作者问题	(42)
《毛诗序》非卫宏所作辨	(43)
《诗序》保存有先秦古说又有汉人增益	(43)
尊序和废序之争	(43)
诗大序的文论文献价值	(44)
小序不必废弃	(45)

《诗经》的产生

【诗的起源】

在至今已经发现的金文和甲骨文等古文字中，“诗”这个字词在西周中期才出现，古文作“讖”，篆文作“诗”。“诗”、“志”、“讖”古音同，而且形近，可相互替换、假借为用，所以“诗”字的本义就是“言志”（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毛诗正义》疏：“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在古人的认识中，人所有思想、感情、志意、欲念都可称为“志”。诗这个概念的本义，就是说诗产生的原因是表达思想感情。《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现代文艺理论认为，一切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诗歌最初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为了激发劳动情绪，协调动作节奏、化解疲劳，创作的“劳动号子”一类劳动歌。这样的理解是简单化的。诗的内容是不断扩展的，在远古已经产生诸如庆丰收、祈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求偶、婚恋等抒情性歌谣，还有叙事性的英雄传说和颂史诗。这些上古的歌谣俚谚，属于原始的口头创作。中国的原始诗歌有古远的历史，相传在考古学定为仰韶文明时期“三皇五帝”的新石器时代，已有神农氏的《虫草辞》、帝尧的《击壤歌》、帝舜的《南风歌》和舜传位于禹的《卿云歌》、歌大禹娶亲的《涂山歌》等，经后世追记而流传下来。在各种古籍和甲骨文片中，现在发现和辑录的远古歌谣还有一些。这说明从原始村社时代起，中国诗歌已经诞生和开始发展，它们都是口头创作，当时没有保存条件，大都自生自灭，有幸被后世追记的为数寥寥，而且大多已不是原貌。

诗歌还有一个重要的起源，就是原始宗教祭歌。现代中外文化学者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证明原始宗教祭歌也是世界各个民族诗歌的起源。宋·王安石《字说》曾提出“诗为寺人之言”。寺人，是祭司主持人。中国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在不同时节举行各式各样的祭礼仪，人们聚集向神灵礼赞、祝祷、祈求。祝词和咒语因为要齐声宣诵，有一些便成为韵语。在祭礼仪式上常常有乐舞，组织一部分人在祭坛上奏乐、歌唱和舞蹈。歌舞是上古祭礼仪式上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要在集体场所演出，一些口头创作的祝词、咒语、祭歌，不能不有所加工；因为要集体诵唱和连年使用，不能不组织在必要的范围内传习；这样，一些韵语的祝词、咒语、祭歌，必然逐渐趋向定型。结合原始宗教祭礼所进行的集体娱乐活动，

一些为群众喜爱的歌谣，也得以通过表演而传播并趋向定型。这就产生了诗歌。

通过诗歌发生学研究，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传播的抒情的、叙事的歌谣，以及原始宗教活动的祝词、咒语、祭歌，是各民族最早的诗歌。这些基因都传承在《诗经》的不同作品之中。

【葛天氏之乐】

《吕氏春秋·古乐》记录有“葛天氏之乐”。葛天氏属于传说中的远古部族，其时代大致相当于仰韶文明阶段。上古音乐和歌曲是不分的。这里说的“乐”，指音乐和唱词相合的在葛天氏部族祭坛上演唱的歌曲：“昔葛天氏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是一组典型的“社祭”的祭歌，社祭是祭祀大地的祭仪，古人把大地供奉为“人类生存和万物繁殖全由大地母亲哺养的生殖母神”。社祭由上古的祭仪传续为后世的民俗。“葛天氏之乐”所歌的八阙，据专家考释：第一首《载民》，歌颂负载公民的土地；第二首《玄鸟》，歌颂作为部族标志的图腾——黑色燕子；第三首《遂草木》，祝各种植物繁茂；第四首《奋五谷》，祝五谷丰登；第五首《敬天常》，歌尊重天道（自然规律）；第六首《达帝功》，表达遵循并完成天帝的分派；第七首《依地德》，表述依照大地的生产规律安排和努力工作；第八首《总禽兽之极》，表述使家禽家畜和狩猎对象大量繁殖。“葛天氏之乐”这组原始乐舞，其内容多方面地表现了原始村社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其艺术形式也被后世艺术史称为中国“歌舞之祖”（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它的内容和形式大部分为《诗经》的祭祀乐舞歌诗所继续。

【《尚书·尧典》纪事】

原始乐舞和一部分口头诗歌创作，在没有文字的上古能够推广应用，并且能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流传，必然要有人进行整理定型和组织传习。《尚书·尧典》中有以下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帝舜说：夔啊！命令你主管音乐，教育青年，教导他们正直温和，宽宏而庄严，刚正而不暴虐，平易而不傲慢。诗表达志意，歌把言语咏唱出来，声调随着咏唱而抑扬顿挫，韵律使声调和谐统一。八类乐器的声音协调，不能互相搅乱伦次，神和人听了都感到快乐和谐。夔说：好啊！我们敲击石磬奏起乐来，让打着各种兽类图腾的众多部落随着音乐跳舞吧。）从后人追记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在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尧舜的时代，

6 诗经学大辞典(上册)

已经注意到用诗乐来教育青年，认识到诗、乐有教育、天人感应、促进各部落之间团结与社会和谐的多种功用。为此，当时已经注意提高祭歌、诗乐的艺术感染力，社会组织中已经有专职人员分工负责。相传夔就是尧舜时掌管音乐的人，负责祭歌的艺术加工、传习和对青年的教育。

相传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唱和的《卿云歌》，已经具有朝会乐歌的性质；至于尧帝时某老者的《击壤歌》、舜操五弦琴歌唱的《南风歌》、大禹的《涂山歌》，则属于抒情歌诗。这些歌诗虽是后世追记，已非原貌，但可以说明上古有口头歌诗流传，而且内容逐渐丰富，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不仅仅是劳动山歌和情歌。

【甲骨卜辞和金文中的韵语】

殷商王朝是家天下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商人重视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制作了宗庙祭祀乐歌。那时已经有文字可以记录，即我们于19世纪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所用的“甲骨文”。经过整理，发现其中有近似诗歌的韵语。如卜辞“癸卯卜，今日雨”，下文四句是四个问句，句式相同，句尾二字同词同韵。《周易》的卦爻辞中，也保存有商代的许多记录，其中《屯》卦六二爻的爻辞、上六爻爻辞、《震》卦辞、《归妹》卦六爻的爻辞、中孚卦九二爻爻辞、六三爻爻辞等，都是借用当时的歌谣，用韵语表达。在西周的金文中也有不少祭祀祖先的祝祷之辞，学者从其中辑出的韵读合计已达二百篇之多。如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所言，这些金文的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虽然根据当时的语言条件，语句极为简短，却可证明在有了文字以后，已有少数歌谣和祝祷辞因某种需要而被记录，就其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它们已经是诗歌的雏形。

《国语·鲁语》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这说明在商周易代之际，周王朝接收的殷朝档案文献，其中应有殷商宗庙祭祀乐歌的记录简册；兼之卜辞中的韵语，卦爻辞中的韵语，这些材料可以证实：殷商时代已有祭歌、乐歌的记录，已有管理人员和制作人员，只是在当时语言和文字发展的水平上，它们还处于书写文学的初级状态。

【汉语发展新阶段的产物】

诗是语言的艺术，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有比较丰富的词汇、灵活的语法和统一的声韵，才可能产生成熟的和广为传播的诗歌；即使是口头创作的歌谣，也只有在相应的书写条件之后，才能记录、加工和定型。1899年起在安阳殷墟出土甲骨卜辞，近年在陕西岐山一带周原旧地又陆续发现西周甲骨文。迄今为止，已发现甲骨文单字四千五百个左右。它们的文字结构已经由独体趋向合

体，而且产生了大量形声字，只是一些字的笔画和部位尚未定型。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字，是现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汉字体系，也无疑是人类最早的文字体系之一。在汉语史上，这个时代正是汉语由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的阶段，西周的经济和文化繁荣促进了这种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复音词。以《诗经》为例，它共二千八百二十六个单字，其中许多单字是一词多义的，所以《诗经》单音词词汇总量四千个，再加上一千个复音词，词汇总量约五千个，可以比较细密、准确地形容事物和表述情意。随着周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华夏国家形成，也形成了以当时镐京一带语音为基础的全民通用的标准语（“雅言”），推动了歌诗的广泛传播。语言是建构诗歌的材料，文字是记录的工具，有了比较丰富的词汇，大大提高了语言表现力，又有了统一各地方言土音的全民标准语，而西周逐渐通行的籀文文字，较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也较易书写。在汉语发展达到这样较高水平的条件下，产生了中国诗歌由口头歌谣转化为书写创作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礼乐文化的成果】

周王朝始建国之初，在周公姬旦领导下，大规模制礼兴乐，创造了西周的礼乐文化。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把殷周更代看做以新制度和新文化代替旧制度和旧文化，周公领导的制礼作乐，就是建设新制度和新文化。当时建立的新制度，就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度，确定了整个宗法社会所有成员在社会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及其相互之间应有的关系；为此制定各种典章制度，把这种政治的和社会的伦理关系法典化，就是“礼”。周礼十分繁富，据现存先秦的有关文献，有祭礼之类、丧礼之类、吉礼之类、朝礼之类、军礼之类、燕礼之类、贵族生活之类……每类都有多种相应礼仪。周礼的内容涵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规定为人们社会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度。

乐，古已有之。乐、歌、舞三者合一，也有悠久的传统，流传下来一些著名的乐章。上古已经认识到乐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感染作用，音乐的声调、歌词的内容、舞蹈的形态，都可以感染人们产生相应心理活动，影响性格和行为；内容美、善的音乐可以正人心、移风易俗、安天下、强邦富国，内容邪、恶的音乐则惑人心、乱天下、危害国家。周公为了安定天下，建设新国家，把乐和礼结合起来，创造了礼乐文化。西周的乐歌，继承了《韶》乐（舜乐），改进了《濩乐》（汤乐），创制了《雅》（当时的正乐），又吸收各地可取的土乐《风》，制作了新歌词，改进与之相配合的舞蹈。“礼”是内容，“乐”是表现形式，通过其感化作用陶冶情性，和顺人心，统一思想，移风易俗，以求

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西周的礼乐文化产生在公元一千年以前，较之奴隶制的殷商文化，它是全新的、先进的；在世界范围内，它所代表的中华文明也是先进的、灿烂的。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来看它们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了，但其中也有某些东西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具有永久的价值。《诗经》正是西周礼乐文化的成果，是反映西周文明的一部代表性典籍。

【祭祀乐舞】

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一再证明：世界各民族诗歌的来源之一是原始宗教的祷词、咒语和祭歌，中国也是这样。仰韶文明时期的“葛天氏之乐”八阙，说明在远古氏族社会早已有祭歌。在殷商时代，商人尤其重视祭祀，制作了不少祭祀祖先神灵的宗庙祭祀乐歌。《国语·鲁语》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可见周王朝开国时接收了殷商王室档案文献，其中就有殷商的祭歌。西周继承夏商两代文化，开国之初大规模制礼作乐，首先是制作祭祀自己祖先的宗庙祭祀乐歌。

周代的祭祀乐歌对原始祭歌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与殷商的祭歌更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周人创造了新的上帝，反映了他们的天命观；二是信仰万物有灵。人类在童年时期认为，宇宙和人间的一切由绝对权威的神灵主宰，产生了原始宗教的神权信仰。商王朝利用神权，创造的天帝是神祖合一的祖先神，他们的王权是天帝之子的世袭。周王朝也利用神权，但创造了一个仁德的上帝，这个上帝选择能实现天帝仁德意旨的人来担任人间的王，赋予代上帝统治万邦万民的权力；如果人间的王不能实行仁德，上帝就要惩罚他，另换实行仁德的人为王。在天人关系上，西周的天命观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天帝能够明察人间的一切，人间的善恶能上达天听，上天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奖许、警告或处罚。天帝安排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天道”（规律），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而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又可以影响天事（规律），即所谓“人定胜天”。西周的祭歌同样是利用神权为王权服务，而所贯穿的政治思想，则是突出一个“德”字；天心好德，民心反映天心，只有实行德治而得到民心拥护，政权才能长治久安。这些哲学观念和政治思想，在三千年前是先进的，放在世界范围来看，当世界绝大多数民族或处于野蛮的蒙昧时代，或处于黑暗的奴隶制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已熠熠生光。关于信仰“万物有灵”，是既崇拜上帝主宰，礼赞祖先神灵，又敬畏日月山川、风雨雷电、草木妖魅……所以周人的祭歌，既有祭祀天帝祖先的宗庙祭歌，也有祭土地山川的乐歌。这在《诗经》的《颂》诗中有明显的表现。在《雅》诗中的农事诗，也有社祭的内容。即使在《风》诗中，也有描写巫风盛行地区祭神驱鬼的歌舞场景。《诗经》中的某些乐歌

的歌词，还保留着祷词、祝词、咒语的痕迹。

【乐官制度】

西周王朝开国之初，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领主制的宗法国家，建立繁荣和谐的社会，把提倡和推广礼乐文化作为基本国策。在出色的政治家周公姬旦的直接领导下，大规模地制礼作乐。为了制礼作乐的需要，建立了国家直接领导的专职机构。《周礼·春官·大司乐》有如下记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大司乐是周代六卿之一，掌管文化教育，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推行乐教，贯彻乐德、乐语、乐舞教育。从这些记载也可以看出，诗、乐、舞三者合一，而且与礼制紧密结合。“乐德”的六德指教育的内容；“乐语”指诗的六体；“乐舞”指六种乐曲配合舞蹈。虽然《周礼》为后世追记，其中可能有若干理想成分，但总体上可以看出周代礼乐文化的组织制度和基本内容。六卿之一的大司乐下面，分设乐师和大（读太）师，乐师掌管学政，大师掌管制乐，在大师下面还有掌管、操作与传习不同乐器的瞽矇、磬师、笙师、镈师等专业技术人员。

周礼繁缛，《礼记·王制》记有祭、丧、婚、冠、乡、相见等六礼，六礼中又各有大礼、小礼，名目繁多，可谓凡事有礼；而不同的礼仪，应用不同的乐舞和歌诗，有十分明细而又严格的规定，贯彻到周代宗法制贵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贯彻六德教育，《周礼·春官·大师》记：“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这个音乐管理机构的首长是“大师”，职责是领导采集、制作朝廷需要的祭祀乐歌和各种典礼仪式上应用的乐歌。《荀子·王制》：“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歌乱雅，太师之事也。”这个音乐官署还负责音乐审查工作，以夏代传下来的雅乐为本，并随着乐器的改良而改进，同时传习舜代的《韶乐》和商代的《大濩》乐等古典乐，制作应用的新乐歌，禁止“淫声”和“夷俗邪音”在礼仪上应用，不让这些不合“六德”的声调扰乱雅乐的纯正。《国语·鲁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比其音律。”宋国的大夫正考父到周太师那里去校正商代颂歌的韵律，说明周代的音乐官署有一个音乐库，里面保管着从商朝接收下来的音乐典册，其中也保管着一些古典的音乐典册。

周代的礼乐，尤其是其中的“大礼”，规模相当大，从《仪礼》所记也可以看出，“大礼”需要出动一个乐团，“小礼”也需要一个乐队。一代代的专业文艺人才，需要培养和进行经常性的训练，因此也必然有培训机构。由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西周有比较完备的乐官制度。西周初年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武王和周公，都重视和参与乐歌的

制作。例如,传说西周开国的《大武乐章》六篇,是武王与周公合作的“颂”诗,“雅”诗和“风”诗中都有“周公作”的记述。是不是他们亲自执笔,自然无从考证,但诗中既用他们的口气,又有这样的记载,而且事迹相合,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他们重视和领导了这些工作。

周代制作和收集的乐歌,不仅保存在王朝的主管机构,也通过对贵族子弟的教学,以及王朝与诸侯国的往来,传播在各诸侯国的贵族社会,成为贵族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一些主要国家也有乐官制,一些贵族也有自己的乐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季札在鲁国欣赏周乐,内容与今本《诗经》目次基本一致,这是一证;鲁国自己又制作了“鲁颂”四篇,这是二证;《论语·述而》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是三证。由于周代建立了成熟的乐官制度,周代的乐诗才得以收集、制作和编订。

【陈诗献诗】

周代曾有公卿列士陈诗献诗的制度。陈献的歌诗,就内容来分,不外美、刺两类。

公卿陈诗较多的是歌颂和赞美。在经过整理的周代乐歌中,除了祭祀诗,还有不少歌颂美德和歌颂文王、武王的诗,也有对时王或有功大臣的颂美。如《大雅》的《云汉》、《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卷阿》,《小雅》的《天保》、《出车》、《南山有台》、《蓼萧》、《六月》、《采芑》、《鸿雁》、《庭燎》、《斯干》等等;在一些饮宴诗中也多有祝颂之辞;即使《国风》中也有《甘棠》(颂召伯)。这类诗的内容基本是歌功颂德。我们不必简单化地把这些颂美之诗统归为“拍马”之作,这些贵族诗人颂美文王、宣王而讽刺厉王、幽王,颂美为国家建立功勋或品德高尚的大臣,而批判、鞭挞那些祸国殃民的佞臣,说明这些歌诗还是有其政治上的邪正是非标准,至少表现了他们理想中的好王和可以作为榜样的好大臣。

公卿列士陈诗献诗之中,还有一些是抨击时政,揭露社会弊病以及倾诉个人哀怨和不平的篇章。《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司,官箴王阙。”《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官……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上诸例可见,西周各代确有公卿列士向国王陈诗进谏的事实。《国语·周语上》记述召公谏弭谤,说明当时明智的政治家已认识到,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应该容许某些批评,并从这些批评中吸取意见来巩固统治。当然,周代这种开放批评的制度,只用于贵族阶级内部。这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所写的以政治讽喻和怨刺为内容的诗篇,比较真实

地反映了厉、幽两朝昏暗动乱的社会政治生活,其感情愤懑、言词激切,较之后代的政治诗少忌讳,表抒大胆率真,在艺术上也是优秀之作。

【采诗说】

据说周代还保存着由上古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制度:王朝派出专门官员到各地去采集民间歌谣。这种官员在各种书上有不同的名称,如“行人”、“道人”、“轩车使者”、“道人使者”等等。采诗的目的是为了知民情、观风俗。采诗之制,先秦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汉代追记有王官采诗和各国献诗两说。

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同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朝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

不同意王官采诗说的人认为:先秦的书并没有说春秋时有采诗之官,《左传》“道人以木铎徇于路”一句中的“道人”是宣令之官,下至各国是为巡查民情宣布政令,不一定是为采诗。《春秋》对王官至鲁皆有记载,并无王官至鲁采诗记载。春秋时代分崩离析,王室衰微,派王官去各国采诗,势所难能。由此可见,王官采诗并无定制。

不同意各国献诗说的人认为,十五《国风》实际是十五个地方的土乐,《周南》、《召南》、《唐》、《豳》、《王》五者不是指国名,说是各国所献就讲不通。再者,列国若各献诗,何以没有宋、鲁、楚及东迁后没有灭亡的各小国之诗。由此可见,各国献诗亦无定制。

近世学者又提出太师(乐官)搜集整理之说。古代设乐官是有定制的,至汉代依然沿袭。《汉书·郊祀志》:“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国语·鲁语》:“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风以观民俗。”这些记载都说明周太师有采诗、陈诗的使命。

史无明据,古无定制,对《诗经》中民间诗歌采集的具体情况,我们参照各种资料,可以不拘泥于一说。王官采诗可能有,是否设派出官员遍及各国采诗倒不一定,即使是宣令之官,也未尝不可附带收集民歌以观民俗。各国献诗也可能有,诸侯向天子进献女乐和贵族之间互赠女乐,本来是全国各地音乐传播的一种渠道。各国之中有进献的,有不进献的,也不一定凡进献的都能保存下来。乐官采集和整理是可信的,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采集、制作和演出。总之,各地乐歌的编采与集中,可以经